

中外名记者丛书

俞颂华

莽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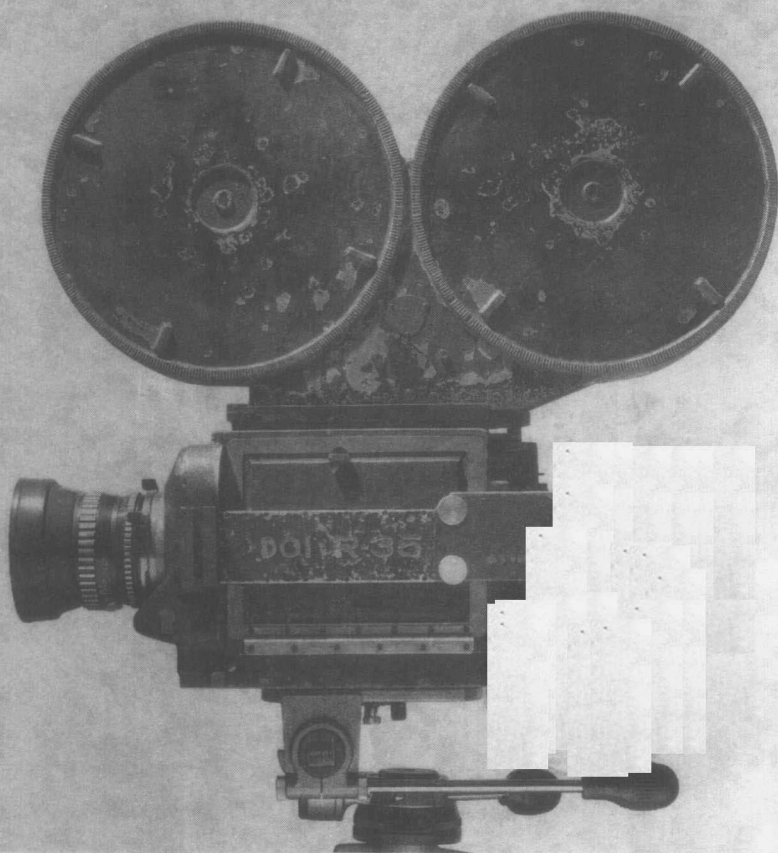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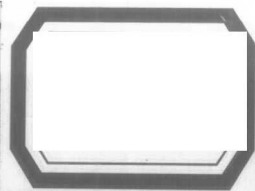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俞颂华

莽 萍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俞颂华/莽萍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4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99-2

I. 俞… II. 莽 III. 俞颂华—评传 IV.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7) 第 05264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俞 颂 华

著 者: 莽 萍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73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375

印 数: 1 - 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99-2/G·279

定 价: 25. 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 15 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1)
前言	(1)
出身与求学	(3)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	(6)
“走向红光里去”——第一个采访苏联的中国记者	(16)
德国之旅	(35)
俞颂华在《东方杂志》	(45)
俞颂华与《申报月刊》	(53)
最后十年：恂恂儒者、颠簸人生	(72)
结束语：追求“真”、“善”的新闻家	(85)
作品选编	(86)
社会之鹄的果何在乎？	(86)
言论终不能自由么？	(87)
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	(88)
从觉悟到自觉	(90)
南满中东道上见闻记	(92)
旅俄之感想与见闻	(95)
俄国旅程琐记	(108)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116)
中欧犹太人的厄运	(126)
谈中等阶级	(129)
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	(134)
一九二九年中的百年纪念	(144)
闲暇与社会进步	(147)
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	(151)
论报业道德	(158)
论梁启超	(167)
富有热情的王芸生	(173)
悲忆钱经宇(智修)先生	(175)

记项致莊	(179)
俞颂华年谱及主要著述	(182)
后 记	(186)

人物评传

前 言

俞颂华（1893—1947）曾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他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惟一终身职志”，虽然他的报生涯并不总是很顺利，但他对此矢志不渝。颠簸困顿的生活和高官厚禄的引诱，都不能使他放弃办报的志趣。俞颂华服务报界三十年，曾主编过几种重要的刊物，如《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解放与改造》、《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光明报》等。这些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起过非同小可的作用，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园地。黄炎培先生赞他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盖因其孜孜于新闻事业，“虽贫病不能移其志也”。晚年，他的身体已“弱不胜衣”，但还有带领学生去南洋办一份独立报纸的乐观想法，然而为病体所累，他的这一愿望终未实现。1947年，俞颂华在苏州寂寞长逝，时年虚龄55岁。

老报人王芸生送给俞颂华一幅挽联：“有德有言不朽，无党无派以终”。这颇能表明俞颂华的人生态度和办报实绩。俞氏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而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相标榜。他常说，“新闻家，重要的是公正的精神。一加入党派，就不免有所偏倚，即使精神仍是公正，事实上亦免不了牵制委屈”。他认为只有此身不为物役，才能明辨是非，言论中正，这种态度确实使他能够在是大非面前保持冷静，并总是站在进步事业一边。他的四十年老友俞寰澄曾说，“我最佩服他的，是他一生坚持无党无派的精神。他立志做新闻家，所以决意做一个无党无派，保持公正的精神。这种忠于职守的真心，淡于荣利的志趣，是近人极少见的。”报刊史家方汉奇认为“俞颂华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爱国，非常富于正义感的人。他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但他并不是无所是非的。”无党无私、公正达观，确实是俞颂华身上最引人注目的

的品格之一。

俞颂华在三十年的报人生涯中，经历过许多大事，编辑过多种报刊，也进行过多次出色的采访活动，其中有两次重要采访值得载入新闻史册。一次是1920年，他和瞿秋白、李仲武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赴莫斯科，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一战后的德国；另一次是1937年4月，他与孙恩霖以《申报》记者名义，访问延安，他们是继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延安情况后的又一批深入延安的记者。

这两次采访活动都是非常出色的。应该说，第一次采访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而俞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他在苏联期间撰写了《赤俄见闻记》和《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实事求是地报道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情况，为增进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晨报》把俞颂华所撰苏俄通讯辑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大受欢迎，到1924年春已印行了三版。

俞颂华是一个不懈地追求真、善的新闻家，也是“五四”以来投身新文化事业的重要思想者和行动者。作为我国第一位的驻外职业记者，他的心路历程和办报实绩是值得后人研究和关注的。

1987年初夏，我到上海查阅有关俞颂华办报的资料，拜访了《申报》当年最后一位总经理马荫良先生、老报人陆诒先生和孙恩霖先生。他们对于俞颂华办报的成绩评价很高。马荫良先生还对我说，俞颂华是一位少有的正直踏实、不计名利的报人。在这次考察中，我也拜访了俞颂华的女儿俞湘文和女婿葛思恩两位先生。他们几年来不惮烦劳地整理、辑录父亲的文章，辑为《俞颂华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并且间接地为我今天写作俞颂华评传提供了帮助。

现在，虽然知道俞颂华的人不多了，但是，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俞颂华的劳绩是不会被忘记的。

出身与求学

俞颂华又名庆圭，祖籍江苏太仓，1893年3月9日出生于上海。他的家庭是世代的书香人家。父亲俞柰云是清末秀才，后受到西学影响，放弃仕途，改习电报业务，由学徒升为电报局总办。他先后在上海、太仓创办了电报学堂，为中国电报业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据唐文治先生为其撰写的墓志铭称：“君天性淡泊，戒奢崇俭，尤尚气节……平居喜研究经世之学，笃嗜曾文正、左文襄二家集，暇时手不释卷，与人谈事务，亹亹不倦，动中肯綮。”他的秉性气质对子女的影响很大。母亲顾氏也出身于颇有文化修养的仕宦人家。可以想见，这个家庭是非常看重子女教育的。他们的子女日后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俞颂华的姐姐庆英曾服务教育界，可惜早逝。哥哥俞凤宾毕业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科，获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上海第一流的内科西医，名重一时。1922年，申报馆为纪念成立五十周年，出版了著名的《最近之五十年》纪念文集，刊载当时各界名家的文章。俞凤宾在其中撰写《五十年来之中国卫生》长文，全面检视中国卫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颇有价值。他在医病之外，还对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卫生不遗余力，写有《卫生丛话》共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俞颂华的妹妹俞庆棠，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著名的社会教育家，曾与梁漱溟先生在一起推广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说，“庆棠先生致力于民众教育乡村建设，彼此同调，所最稔也。”1949年底，俞庆棠女士应邀回国参加人民政府和政协的工作，因为过度兴奋和劳累，回国不久即病逝北京。

俞颂华在上海出生成长，在这个城市里受到相当完备的教育。本世纪初，上海已是拥有近80万人口的大商埠。由于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文化的侵入，上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交汇点，表现在教育上就是中西并重。俞颂华幼年入私塾，既读中文，也读英文，因而打下牢固的中、英文功底。大约在1905年，他进入上海健行公学学习。其时，蔡元培正担任学校的“总理”，

柳亚子是这所中学的国文老师。据柳亚子记述，健行公学是上海“以讲学为宣传革命之大本营”的学校之一。学校的课程“注重科学、英文、算术、理化、体操等”，取消了修身和读经一类课程。教员中许多都是极具才华的大学问家，比如理化教员马君武，国文教员刘师培、高天梅、柳亚子等。这些人在教育界也都是有名的老师。俞颂华在这里受到初步教育，后来健行公学解散，俞氏转入澄衷学堂。

澄衷学堂是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据胡适记载，这所学堂原是宁波富商为本乡子弟办的学校，后来渐渐成了上海的名校，学生就不止是宁波人了。这所学校的好处是，学科比较齐备，其中更注重国文、算学和英文。在这个学堂里，教员的思想大多比较开明，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报刊文章等在学生中流传最盛。胡适也是澄衷学堂的学生，比俞颂华早两年入学。他说那时候读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俞颂华呢，在进入澄衷学堂之前就接触了新思想，到了这所学校后，更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曾说：“因为梁氏的《新民丛报》和章太炎氏的《国粹学报》比较上都容易买到，所以这两种刊物，便成了我当时的一种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蔡子民先生办的《警钟日报》，我也非常爱读，天天要看。后来，其他新书报越出越多，我也都买来阅读。我爱好书报，其后于编辑生活，乐之而不倦，可以说就是在那时候种因的。”这是俞颂华最初与新式报刊发生联系，从此，他的一生就和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9年，俞颂华十七岁时，考入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大约那时的清华学堂还没有后来清华大学的学术自由空气，学校对于学生的要求很严，也很刻板。俞颂华不愿意在思想上受到束缚，旋即离去，同年转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学习。其时，复旦公学的校长是严复，后来又有高梦旦、马相伯等担任校长，都是当时社会的名流，可以想像学校里的学术气氛是极好的。俞氏的同学中许多也是极有才气的人，他说：“当我考进复旦公学的时候，校中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才毕业。经宇（钱智修）先生与陈寅恪先生等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记得故友梅光迪先生那时还比我低一班。”可见这一时期的复旦公学是出了许多著名人物的。俞颂华在复旦公学得到基本

的学术训练。1914年，俞颂华毕业于政治经济系。

在这期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读书的俞颂华曾随其兄俞凤宾组织的救护队，到革命军作战的前线南京和浦口等地，救护革命军士兵。这件事情表现了他支持革命的热情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心情。

俞颂华毕业后第二年，即1915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清末民初，中国学生想求得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多半会留学西洋或东洋。当时，以到东洋日本留学者为多，因为日本的近代教育因袭西方，大学比较发达，学科先进并较为实用，加上日本与中国距离较近，语言文化多有相通之处，费用亦较低，因而吸引了大量中国学生。这时的日本已是变法成功的国家，此之古老的中国，它的发展和变化是惊人的。日本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并转化为适应自身的现代方式，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也是推动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的基本动力。

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是很有名气的大学。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俞颂华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社会学专业，而实际上，他关心的问题很多，兴趣很广泛，所学的课程也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这与当时这所大学的气氛是相协调的。本世纪初期，东京法政大学是日本人文思想荟萃之地，西方的各种学说主张都在大学里传布，加之人才济济，思想的撞击是很强烈的。所以，此时的人文熏陶对俞颂华来说，是终生受益的。这一时期，俞氏接触到泰西传到日本的各种思潮，也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问题发生兴趣，然而诸多激烈的社会思潮并未使他成为一个激进主义者。相反，他认为社会进步需要持久不断地努力，应该从具体建设做起。这自然得赖于他温良敦厚的性情和通达宽容的思想品性，也得赖于他的家庭教养。

1918年，俞氏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旋即回国。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

1919年4月，俞颂华由朋友张东荪约往《时事新报》主编“学灯”副刊（当时张东荪是《时事新报》的主编）。这一年，俞颂华二十六岁。这是他从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从此，俞氏走上了做“新闻家”的道路，前后共三十年。“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在俞氏看来，既认定某件大事，便须忠于其事，专于其事，将一生精力贡献其中。俞颂华从中学时代便想要投身报界，以改良社会为目的，矢志不渝。从日本留学返国后，他曾患过一场大病，医生说右手须开刀，他坚持不允，并说日后的工作，将全靠右手。这件事体现了他对于从事新闻业的坚执和信心。以他的经历看，他的确是努力地实践了真正的人生，稳健出色地完成了自己选定的事业。

俞颂华主编“学灯”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恰是国人为国事痛心疾首、激动不已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俞氏刚一上任就调整了“学灯”的版面，使之成为严肃探讨问题又富有生气的副刊，以与消闲性报纸相区别。的确，它与民初报纸的副刊是大有不同的。

民初报纸的“附镌”（副刊）大都是消闲性的，因为副刊这种形式一出现就是以刊登诗词歌赋为主的。花草游戏、通俗小说是副刊的主要文学。所以，专有鸳鸯蝴蝶一派文人占领副刊。这也难怪，据报学史家戈公振的看法，当其时，“音乐会与跳舞会不多有，戏园与游戏场喧嚣齷齪特甚，当此社会设备不完美之时，凡有文字知识者，舍读日报副张以调节其脑筋外，几别无娱乐之可言。”但是，当时的报纸副刊有没有满足人们的这个需要呢？戈公振认为，“今日各报之副张，……或偏于旧，一意模仿古人作品；或偏于新，有类学校讲义。下焉者，则搜罗新奇之事物，谓姑志之以供博物学家之研究，非失之荒唐，即失之滑稽。是编者欲供读者以娱乐，而结果适得其反。”可见副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的情形是，副刊在报纸上处于无关痛痒的地

位，内容上也并不特别高明，很难办出新意。然而副刊又确乎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表达报纸的立场，也创造综合性报纸的概念。好的新闻家在副刊上可以大做文章，发挥舆论的功效。

《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创设于1918年，起初每周出一次，每星期只占大半版（下半版为“新闻屑”副刊）。1919年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版面也自二月起扩充为两版。俞颂华即是在这时开始接手“学灯”的。俞颂华在主编“学灯”之初，就显露出富有编辑才能和远见，这大约和他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他对版面分配和内容做了较大调整，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并真正体现“学灯”的发刊宗旨：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除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他把原来登载于“佛门丛载”栏的文章减少了许多，发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征文，受到各类探究者的响应。仅在这个栏目，就刊登了一系列有质量的文章，比如《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列宁著〈俄国问题〉》、刘南垓的《社会党之泰斗马克思之学说》，以及日本思想家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等著作的译文，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俞颂华还在“学灯”设立了“思潮”栏目，介绍各种社会思潮、流派和主张，旨在探求救国之路，这正合乎当时的气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国向何处走，这差不多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寻找中国的出路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形态成为很迫切的事情。我们从“学灯”所刊登的文章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热情在今天看来是极为感人的，虽然看起来也有一些幼稚。“先进者”们一股脑地搬进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和理论，急切地想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学灯”上刊载了大量的介绍文章，李大钊、杨昌济、陈望道等都发表了关于政治、伦理、教育和语言学的写作和译作，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也转发过。“学灯”成为当时文化界传播新知的园地，它探讨的问题是相当广泛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包容性。

俞颂华主编“学灯”时，非常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新文化运动的成长。这一时期，“学灯”每期都刊载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章和新文学创作，介绍新文化刊物。它的“介绍新刊”栏中刊载了许多五四时期刊物的发刊词和目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努力，使“学灯”成为与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同样著名的新文学创作园地。方汉奇在《俞颂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一些五四作家的早期作品，就都是在他担任主编时期的‘学灯’上发表的。郭沫若第一次‘诗的创作爆发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学灯’上开其端绪的。”茅盾等新文学作家也都在“学灯”上发表过作品。由这些努力可以看出俞氏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大变化是非常关心的。他对于“当下”的关切远甚于过去。他始终认为“疗救”中国，不仅仅要破坏旧事物，也要建设新事物，那才是真正有益的事情，而可悲的恰恰是打破了旧文化，却不能创建出新文化。所以他对于创造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励的。这一点体现在他主编的“学灯”副刊中，就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鼓吹和推动。在俞颂华手中，“学灯”已开始具有崭新的面貌，并成为“上海报坛的一盏明灯，在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中起着鼓舞的作用”。（徐铸成：《报海旧闻》）

这几个月的编辑工作，对俞颂华形成自己的编辑风格很有帮助。俞氏的编辑主旨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兼容并蓄”，也就是屏除门户之见，自由发表言论。虽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不过俞颂华对于争取实现这个原则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学灯”评论栏发表的文章《言论终不能自由么？》，就对言论自由有清楚的指陈：“大凡革新家在言论上负两种责任。一种是批评旧习惯和旧制度的责任，一种是创造新的责任。因此，言论自由不但可以防遏社会变态的发生，并且能促社会循进化的常轨发达。”他看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并且努力在“学灯”副刊上实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1919年5月起，在“学灯”上发表文章的人数明显增加了，二是所发文章的内容更加宽泛，言论虽然围绕共同的主题，但是意见却是多种多样的。俞氏主编“学灯”虽然仅三个多月，但是奠定了“学灯”在文化界中独树一帜的论坛地位，使其成为五四时期有名的三大副刊之一，受到读者

的欢迎。

在这期间，俞颂华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和短论，大略算来有40多篇，平均每两天写一篇。他不仅仅是“学灯”的编辑，也是“学灯”的作者，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报人的特点和报业的传统。清末民初，报纸的主编往往自主笔政，能编辑，能写作，常常报纸快要复印了，看看还缺文，就可以来个“急就章”补上去，一点也不比预先写的差。究其原因，一则早期报纸因“其时交通未便，消息难通，故主笔政者常须述野语稗史以补白”（戈公振语）。二则彼时报人多半学养深厚，要么是文采斐然的文人，要么是各行当的专家学者，比如创办《中外纪文》、《强学报》和《时务报》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发起《国闻报》的严复，参与《苏报》编辑的章太炎，《远生遗书》的作者黄远生等等，都是大学问家。国人中最早创办日报《循环日报》的王韬，学识渊博，眼光远大，他在日报“冠首”所作的“论说”，堪称雄辩，“一时无两”，后来集为《强园文录外编》，有很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其实所谓“倚马可待”究竟是要有深厚的修养和才华来支持的。俞颂华不能说是上述那类才华横溢的倜傥才子或大学问家，但他是一位立论公正、学养极好的报人，所以随手写来的急就章也都是可读可看、有见地的好文章。

他的文章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富有建设性，从“社会进步三面观”，到“与胡适博士之谈话”，从“北京学生之表示与法律本位之变迁”，到“社会与文化”讲演录，关切的问题不可谓不多。其时，五四运动方兴未艾，所以俞氏谈论最多的还是学生运动，有15篇之多。而“学灯”自然也为学潮提供了大量篇幅。俞颂华把五四运动看成是军阀统治的“恶浊势力与教育界之搏斗”，赞扬学生们“爱国精神之深厚”，同时也为学生们的处境而担忧。他在短论《国民对爱国青年之态度如何！》中写到：京电传来，各校学生，为外交之危亟，奋起而有示威之举。是非曲直自有定评，而察其示威之举动，纯出于爱国之真忱，又为当世所公认。乃政府不谅，逮捕学生，盈廷聚讼，议处极刑，而不悟此次之发动，实由政府自造，其愚真不可及哉。使吾国尚有几分正气存者，国民对于庄严之大学，爱国之青年，当

决不使其受政府威力之荼毒。吾国文化前途之进退，我将于此次各界之能否保全学生，保全大学，以及国民于纪念国耻之余，能否主持正义卜之矣。”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军阀政府的武夫本质也越来越暴露了，俞颂华也越加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热情洋溢地赞美到：“天下真自觉者，能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势力所诱，又不为他人所利用。今日北京之学生，受政府威力之压迫，蔑以加矣，然而始终不屈，百折不挠，其知耻而力行固可敬，其真自觉又难能可贵也。”可以说，是正直的秉性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他和学生们站在一起。他坚持的是正义，为的是使社会国家有健康的发展。

俞颂华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一般都是用笔名“澹庐”发表的。“澹庐”取意“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可见俞颂华不求显达的心性。这份清高不入浊流、贫病不移其志的秉性是俞颂华坚守不渝的，而这又与他全身心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正可看成同一回事。

正当俞颂华主编“学灯”兴致甚高时，他的岳父未经征询他的意见，就把他推荐给常驻海参崴的中国驻苏俄特使李家骥做日文秘文。俞颂华全心不乐意去做这个差事，尽管这是一条升官的捷径，并且待遇优厚。那时俞颂华在《时事新报》的月薪仅50元，而去海参崴可以拿到200元。妻子钱梅先劝他先去看看，不称心就回来。俞颂华不好违背岳父的好意，只好去一趟，可是他打定主意“去去就回”，并且安排好，在路过天津时会见梁启超，游说派遣驻外记者事宜。

俞颂华早就想要去国外考察，可是并不是作一个官员的随从，而是作为一自由采访的记者。他刚刚进入《时事新报》时，就向张东荪建议去苏俄欧洲采访，一来可以实地看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国人，二来可以转道欧洲游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情形；并通过这样的采访，逐步建立中国报纸自己采访国际新闻的传统。那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上面难免受到控制，因而也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单靠一家民间报纸的力量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以往报纸声称在外国派有

访员，基本是虚张声势。这一次，俞颂华要去国外采访却遇到一个好机会，就是《时事新报》和《晨报》有可能联合派赴特派记者。

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是南北呼应的两家报纸，并且都有“研究系”的政治背景。所谓研究系，是以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宪政研究会”为主的一种政治力量。梁氏在北京创办了《晨报》，在上海与张东荪一起接盘《舆论日报》，改造为《时事新报》，就是为了宣传研究系的主张。五四时期，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曾在两报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鼓吹新文化运动，因而两报均有全国性的影响，是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报纸。因为两报的这种关系，所以，俞颂华在北上途中，和梁启超见面，商谈此事。梁启超这时刚好参加了1919年巴黎和会，也痛感中国与国际上交往甚少不利国家，正计划派中国记者去国外采访。所以他介绍俞氏与《晨报》总编陈博生商量，由《晨报》和《时事新报》联合派俞氏赴苏俄、欧洲采访。这次会晤确定了俞颂华去国外采访的意向。这样，俞氏就回到上海准备赴苏联采访的诸项事宜。从上海到海参崴，再返回，前后不过三个星期，他是“原船打回”的。

俞颂华这么快就回到上海，使他的夫人感到十分诧异。但是，她从此知道了俞氏“热衷新闻事业，志不可夺”。几十年后，钱梅先女士说：“自那以后，他对于任何工作的选择，若不商诸于我，我决不再参与任何意见”。在那时，做一个好的新闻家的妻子大概是很难的罢。俞颂华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就主动放弃了祖上的财产，要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所以他们的小家庭自俞氏工作以来，经常处于经济拮据状态。而从1920年5月起，俞颂华去国离家近四年，钱梅先只好靠教书独自抚养幼女，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俞颂华在筹备去苏联采访的时候，适逢老友张东荪要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于是，他受张东荪之邀，和张氏共同担任这份杂志的主编人。《解放与改造》于1919年9月1日创刊，其宗旨是要解放中国社会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之不自然不合理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借鉴。因为抱着这样高远的理